流量是“敲门砖”，业态才是“压舱石”

林 洁

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曾说，将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那些被流量砸中的小城——但“15分钟”是一种提醒：被看见的机会是随机的、短暂的、不可依赖的。

当下不少小城都梦想着天降流量，并希冀将其转化为留量。可现实很骨感：在缺资金、缺好设施、缺消费力的小城，商业和服务业态需要客流量才能活，常态客流养不活业态，而流量真的来了，原有业态的设施和服务水准又接不住需求。

那么，小城到底该怎么做业态？硬件拼不过大中城市，但可以拼软件——文化，这不是指高深的文化，而是在地文化。让业态的起点从本地文化肌理里长出来，它们原本散落在日常里，需要被识别、组织和转化。

从文化角度切入，能做的事有很多：

第一层：让人被看见，而不是被替代。流量来了，小城最容易干的事是把部分本地人转移、引进外部团队搞“高大上”的项目，但如果让本地的戏班继续在广场上唱、让手艺人继续在街角做活、让老人继续在茶馆里摆龙门阵，游客撞见了，那个冲击力是此地独特的。小城养不起投资几千万元的实景演出，但养得起社区戏台每周末一场本地戏班演出、养得起傍晚广场上自发的唱念做打。这种演艺不需要新建剧场，不需要专业编导，它就在本地人的生活里。游客站在广场上听半小时地方戏，记忆比买纪念品深得多。

第二层：让文化供给“可进入”，而不是只可远观。

很多小城的文化资源是“锁着”的——非遗在展馆里、戏在庙会上一年演两次、老建筑空着不让进。可持续的在地业态，较低成本的形态就是把锁着的东西打开：能开放的老建筑，做好保护措施，改成能进去坐坐的空间；戏台演出从一年两次变成每周一次，游客可以买杯茶坐着看。当这些空间被打开，游客有机会体验和消费本地生活——看一场戏，是演艺业态；住一晚本地人开的民宿，是住宿业态；吃一顿本地菜，是餐饮业态；买一个手艺人做的物件，是零售业态；逛一条本地人也在逛的街，是街区业态；参加一次本地人的节庆活动，是节庆业态。这些业态不需要大投资、大客流，它们本来就长在本地人的生活里，只是现在经过组织、设计后向外地游客敞开。

第三层：让文化内容可带走，而不是只可消费一次。

游客在小城能买到跟本地文化有关系的小物件：一本当地学者写的书、一个手艺人做的实用器具、一袋本地人自己吃的土产。当地政府部门能帮的是：帮手艺人做品牌、做包装、做故事，让土东西原本沉寂的来历重新被看见。这比建景区便宜，比搞节庆持久。

流量是“敲门砖”，业态是“压舱石”。比期待流量更重要的，是培育一种不靠流量也能自洽的地方文化自信。小城本地生活里那些有文化味道的日常场景和营生，就是低成本、真实有人气的在地业态，它们不靠游客活着，但游客来了，它们就是稀缺的体验。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文旅评驿工作室

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与音乐剧声乐教学的互补性研究

伊里奇

音乐剧是一门融合歌唱、舞蹈和表演于一体的综合舞台艺术，其中歌唱居于核心地位。受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很多高校音乐剧声乐教学借鉴西方声乐教学模式，以西方声乐技术、审美风格为教学重点，虽然帮助学生掌握了科学扎实的演唱技巧，却也在无形中与中国作品、东方审美渐行渐远。近年来，《赵氏孤儿》《梁祝》等中国原创音乐剧蓬勃发展，这些作品不仅与中国传统声乐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更彰显着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气质和精神品格。所以，应该对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进行全面审视，明确其与音乐剧声乐教学在多个维度的互补性，并将其有机融入教学中，在摆脱教学困境和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构建起当代本土化音乐剧声乐教学体系。

审美追求互补

音乐剧的歌唱并非单纯的声乐演唱，而是与剧情发展、形象塑造、气氛渲染等紧密联系的。换言之，就是歌唱要为戏剧服务，只有歌唱与表演、舞蹈水乳交融，其价值和意义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彰显。这一审美追求与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中和”是一致的。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追求字与声之和、技与情之和、人与境之和。比如，昆曲演唱中便要求声、情、景、人四位一体呈现，不能有任何一项表演要素脱离于整体而单独炫技，否则便是一种失和的表现。所以从审美内核的角度而言，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与西方音乐剧是高度一致的。反观当下音乐剧声乐教学，一个重要误区便在于过度强化技术训练，忽视审美风格的呈现。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融入可以使这个短板得到有效补足。

演唱技术互补

中西两种声乐文化在技法方面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在气息控制、咬字吐字、音色塑造等方面有着共通的准则，并可以形成良好的互补。比如，在气息控制方面，西方音乐剧演唱多采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法，旨在获得饱满和持久的气息支持，满足演唱和抒情的需要。中国传统声乐同样强调气息的重要性，素有“气乃声之本”的说法，主张以丹田为核心，讲究气沉丹田、虚实相生，并构成多层次的气息体系。特别是虚实气息的转换技巧，可以有效补足西式演唱气息固化和单一的短板，实现更精准的情感表达。在咬字吐字方面，西式声乐演唱的咬字吐字以元音为核心，音色固然优美明亮，但是其所适配的是拉丁语系，无法照搬到中国音乐剧声乐演唱中。中国传统声乐演唱追求“字正腔圆”，通过咬字头、吐字腹和收字尾三个过程，获得以字行腔、以声带情的效果。将中国传统声乐的咬字吐字理念和技法融入音乐剧声乐演唱中，可以让演唱更加符合汉语的语言特点，使作品的民族化风格得到凸显。在音色塑造方面，西式演唱受演唱方法的影响，音色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形象塑造需求，而中国传统声乐讲求一人一声、千角千色，可以通过滑音、颤音、拖腔等润腔手法，将不同的角色形象生动展示在观众面前。

情感表达互补

情感表达是中西声乐演唱共同的追求，两者的情感表达方式各有所长，同时又互为补充。西方音乐剧演唱推崇情感的极致宣泄，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下，以大开大合的演唱呈现出震撼的情感表达效果，虽然可以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击力，但也容易陷入过度炫技、内涵空洞的误区，可谓是优劣分明。中国传统声乐演唱的情感表达追求含蓄和真挚。比如，戏曲演唱讲究将情感藏在声和字中，通过气息、咬字吐字、润腔等，让情感得到真实和持久的表达。民歌演唱的情感表达则更显质朴。劳动人民看到什么就唱什么，想到什么就唱什么，演唱完全是情由心生的过程和结果。两者的互补性在于，可以让音乐剧演唱实现张弛有度和动静相生。在激烈的高潮段落演唱中，可以通过西式演唱获得强大的爆发力和张力，强化戏剧冲突，凸显形象特质，而在一些吟唱、抒情的段落中，可以借鉴中国传统声乐演唱，以内敛、质朴的方式传递出真挚的情感，有效避免演唱审美同质化、表达极端化的问题。

叙事逻辑互补

西方音乐剧以“宣叙+咏叹”的形式叙事，先通过宣叙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等信息，然后通过咏叹集中表现戏剧冲突，抒发人物情感，其优势在于简单明了、节奏明快，有着较强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但是这种过于单一的叙事方式，在客观上忽视了情节铺垫和氛围渲染，让很多学生的演唱只会直白抒情，无法深入塑造人物形象、诠释作品主题内涵。中国传统声乐演唱则有着独特的叙事逻辑，比如，在戏曲演唱中，会通过“散—慢—中—快—散”的节奏变化，将事情的起因、发展、高潮和结局以起、承、转、合的顺序娓娓道来。又比如，可以将民歌演唱视为绘声绘影的故事，演唱者采用近似口语的节奏和语调，同时会在演唱中切换不同的叙事身份，而且通常不会直接呈现内容，而是先造境后叙事，让整个演唱呈现出鲜明的“缘事而发”的特点。两者的互补性在于，可以共同构建起“叙事—抒情—意境”的演唱表达体系，让学生的演唱既有强烈的舞台戏剧冲突，又能细腻地讲好中国故事，营造东方审美情境，从而促进演唱质量的整体提升。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与西方音乐剧演唱，两者并非对立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特别是在中国原创音乐剧蓬勃发展的今天，更需要树立学习和借鉴理念，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全面引入教学中，解决当下教学中的多个短板，推动音乐剧艺术的中国化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更好传承。

（作者单位：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本文系2025年北京舞蹈学院院级课题“中国传统文化在音乐剧声乐教学中的体现及运用”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0625052/050）

美育视角下陕北民歌合唱的高校传承与创新

高 晶

陕北民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包括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及红色歌曲等，曲调婉转、高亢，反映了陕北人民的劳动生活、爱恨悲欢与革命奋斗历史。在高校音乐专业教学中，合唱是集体音乐实践的有效载体，将陕北民歌进行多声部合唱改编，让学生通过合唱排练、舞台展演感知方言唱腔与地方文化，是实现陕北民歌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

美育视域下的陕北民歌合唱传承与创新，需要将原生态的民间音乐资源转化为“课堂化”与“舞台化”的教育实践，通过合唱这一艺术形式，在保留地域文化基因的同时，赋予其符合当代审美与教育规律的新生命，从而构建起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立体化传承生态。

美育视角下陕北民歌合唱在高校的传承价值

（一）审美美育：重塑学生听觉审美。高校学生长期接触流行音乐，对传统民间音乐、原生态唱腔相对陌生。陕北民歌改编的合唱通过本土乐器编配重构、多声部改编、现代和声融入，保留陕北民歌中滑音、颤音等特色润腔，打破西洋合唱单一审美体系，让学生建立民族音乐审美，弥补本土民间音乐审美教育不足。

（二）人文美育：价值认同与红色基因传承。陕北民歌中的劳动号子反映过去劳动人民开荒劳作、拉纤打夯的生活；信天游旋律高亢、即兴演唱；欢快热闹的秧歌调，比如《拥军秧歌》，承载着革命记忆。合唱教学以民间歌曲为媒介，完成了从乡土民俗教育到思政教育的美育与思政融合。

（三）实践美育：通过合唱排练培养协作品格。合唱是群体性艺术，合唱排练中要求音色统一、情感同步，区别于独唱的个人表达。学生在排练、展演中学会倾听、配合、包容，以艺术实践塑造健全人格，契合美育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需要。

（四）文化传承美育：实现文化遗产活态延续。老一辈民间歌手逐年减少，一些原生民歌存在传承断层的风险。高校通过课堂教学、社团排练、田野采风，将民间口头音乐转化为标准化合唱乐谱，完成文字、音频、影像存档，培养青年传承群体，构建校园非遗传承梯队。

美育视角下陕北民歌合唱在高校传承的现状

（一）缺乏系统教材，课程体系不完善。一些高校缺乏针对陕北民歌合唱编排的专用教材与系统化的理论支撑，陕北民歌合唱改编的曲目储备不足，课程体系有待完善，未开设陕北民俗、方言等相关课程。

（二）舞台表演模式单一，情感表达不足。往往采用“站立合唱+简单手势”的单一形式，缺乏民歌的生活场景叙事，学生在表演中缺乏足够的共情能力，音乐表达感染力不足。

（三）美育融合不足，非遗传承与校园育人体系脱节。陕北民歌合唱多归属于艺术团、赛事节目，未融入通识美育课程，覆盖面窄，仅少数艺术生接触。一些综合类院校缺乏配套美育活动，未联动文学、舞蹈、美术专业打造综合性乡土艺术课堂，文化传播影响力有限。

美育导向下陕北民歌合唱的高校传承路径构建

（一）以课程建设为根基，搭建分层递进的美育传承路径。课程建设是校园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榆林大学立足全员美育、专业深耕、精英培优的育人逻辑，构建分层分类的陕北民歌合唱课程体系，打破民歌传承碎片化困境。打造“专业教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双师共育模式，筑牢传承人才根基。聘请尚飞林、王向荣等民歌专家组建师资团队，搭建“鉴赏—解析—演唱—传承”阶梯式课程体系，开设《陕北民歌解析与演唱》《陕北民俗音乐文化》《陕北民歌鉴赏》等特色课程。课程打破单纯声乐技术训练模式，将方言咬字、润腔技巧与陕北民俗文化、红色历史叙事相结合，引导学生理解民歌背后黄土高原民众的生命情感，实现从“学会演唱”到“理解文化”的美育升维，解决民歌教学“重技巧、轻文化”的问题。

（二）坚持学生主体，搭建多层次、多元化平台。榆林大学常态化举办陕北民歌合唱大赛、民歌专场音乐会、校园艺术节、周末剧场，组建校级民歌合唱团队，鼓励多学科学生共同参与合唱创作与表演。合唱表演形式突破传统静态列队合唱，探索无伴奏合唱、情景合唱等多元形式，学生结合民歌意境进行二度创编，既有原生态信天游的本色演绎，也尝试将流行音乐元素融入合唱改编，在保留陕北乡音内核的前提下赋予民歌合唱当代表达。合唱舞台不再局限于艺术特长生竞技展演，而是成为全体学生审美体验、团队协作、创意实践的美育场域，该校民歌合唱作品多次在全国、省级大学生艺术展演中斩获奖项。

（三）构建校地协同传承机制，拓展美育边界。榆林大学联合陕北民歌博物馆、非遗工坊、地方文旅单位共建美育实践基地，把博物馆打造为民歌合唱教学的“第二课堂”。组织合唱团队下乡采风，收集整理民间口传曲谱；组织学生参与社区美育、“三下乡”支教、地方民俗文艺展演，将校园合唱成果输出到社会舞台。同时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传播陕北民歌合唱作品，推动非遗民歌在青年群体“破圈”传播。

与此同时，学校挖掘陕北红色民歌的美育与思政融合价值，将《东方红》《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红色民歌纳入合唱排演曲目库。学生在合唱排练与舞台演绎的过程中，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与家国情怀，实现美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不少参与民歌合唱学习的毕业生进入中小学、文旅行业，成为陕北民歌持续传承的新生力量。

实践证明，地方高校开展陕北民歌合唱校园美育，应当立足本土地缘文化资源，以课程体系为根基，以合唱舞台创新为实践载体，依托校地联动机制，坚持守正创新。舞台创新不能脱离黄土文化内核，改编与表演设计应服务于审美感知、文化理解，使舞台创新实现非遗传承、人才培养与区域文化振兴等多重价值。

（作者系榆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3年榆林市科技局项目“榆林保宁堡老秧歌文化内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23—CXY—113）

数智时代文化遗产『活化』助推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研究

薄长东

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高校思政教育非常生动、厚重的育人资源。数智技术凭借沉浸式、交互性、智能化的特点，可为发挥文化遗产育人潜能提供关键支撑。本文立足于文化遗产“活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课程体系重构、教学方式创新、实践阵地建设、师资队伍优化四个方面，以数智赋能文化遗产“活化”为切入点，深入探索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实践路径，旨在更好地发挥高校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与亲和力。

数字化文化遗产资源，夯实思政课程素材体系

教学内容的不断优化是文化遗产“活化”融入思政课的基础保障，关键在于将分散的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条理清晰的课程素材体系。对此，可以从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模块化教学单元设计、数字化平台创建三方面入手，筑牢文化遗产助力思政教学的内容根基。其一，依托本地资源禀赋，汇聚思政课教师、相关专业教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技术员等跨学科师资力量，借助数字采集、智能标注等技术，对辖区内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理并数字化建档，在此基础上，重点挖掘蕴含在文化遗产资源中的爱国精神、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编制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文化遗产思政元素图谱，清晰地呈现各类文化遗产与思政教育主题的对应关系，为后续课程转化提供内容支撑。其二，依托文化遗产思政元素库，运用智能匹配算法对接思政课程现有框架，研制出集文化背景、思政解读、案例分析、实践驱动、素养评价于一体的模块化教学单元。其三，利用现代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对文化遗产影像、专家访谈视频、非遗口述史料等多元数据进行光学字符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建立起标签化的检索云端，提高教师调取、使用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效率；设置在线编辑、资源共享、成果留存等功能，支持广大思政教师上传优质教案、精品课件、创新教学设计等教学成果，构建动态迭代、共建共享的开放式教学资源库。

创新数智融合教学模式，厚植思政素养递进提升根基

教学模式的创新应跳出以往单向性理论讲授的局限，突出学生主体，打造体验式、探究式、创造式教学模式，实现学生思政素养从感性认知向理性思辨再向主体性建构的递进提升。其一，借助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革命旧址、工业遗址、历史街区等文化遗产原生环境，学生只需佩戴虚拟现实设备，便可置身于特定历史场景中，目睹文化遗产的历史风貌与艺术魅力。随后，教师以工匠技艺、文化内涵、社会观念等为切入点，提出引导性问题，让学生在思考和讨论过程中将感性体验转化为理性认识，进而内化为文化自信，让技术体验成为促进思政育人目标进一步落地的有力载体。其二，以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依托，让学生组成跨专业小组，针对如何避免非遗项目传承断层、如何进一步促进历史街区保护等相关问题，运用大数据分析、数字孪生技术开展从文献梳理、数据研判到方案产出的全程项目式学习。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思政教师应引导学生挖掘议题中的文化自信、时代责任、社会担当等价值内涵，帮助学生完成对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意义从浅层感知向深层思辨的认知升级。其三，鼓励学生运用人工智能绘画、三维建模、短视频制作、游戏引擎等数字工具，对传统纹样、非遗技艺、红色文化等主题进行二次创作与现代表达，并借助智能推荐算法与云端协作平台，将作品精准投放到校园文化展览、社区公益宣传、文化科普推广等场景之中，增强学生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责任意识与行动自觉。

深耕行走的实践课堂，拓展思政实践育人时空

多元实践载体的拓展是文化遗产“活化”融入思政课堂的重要保证，这就需要依托线下行走实地体验与云端虚拟实训双轨并行的育人机制，形成虚实互补、知行合一的实践体系，让文化遗产进一步成为思政培根铸魂的生动课堂。线下实践分校内校外两个方面。在校内，可以创建非遗工作室、劳动教育基地，开设剪纸、陶艺、刺绣等非遗体验课，聘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到校园驻点指导，并运用三维建模、数字扫描等技术将学生的创作成果数字化保存，制作成可永久保存、在线展示的数字藏品，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技艺，领悟工匠精神，使技艺的学习与思政价值的培育同向而行。在校外，可以本地革命旧址、古村落等文化遗产资源为依托，建立思政教学实践点，由教师带领学生对相应文化遗产资源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等进行解读，组织学生分组进行口述史采集、古建筑测绘、文化主题纪录片拍摄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文化场景中深化认知、厚植情怀。线上实践方面，利用网络三维、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创建“云游文化遗产”虚拟实践平台，整合数字孪生模型、全景影像、智能交互解说等资源，学生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随时随地进入虚拟场景进行自主学习、完成实践任务；在平台上设置交互式社交场景，让学生可以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实时互动，从而拓展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体验感；同时，引入区块链技术，对学生的非遗创作、实践调研、研学心得等实践成果进行确权存证，采用数字化激励机制，调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为思政课实践育人提供优质的载体。

多维赋能师资队伍，强化思政育人人才保障

文化遗产数字化融入思政教学这一过程，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性、技术性、思想性特征，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全方位、高阶化的要求。可以从培训赋能、队伍完善、校外合作三方面着手，构建专业化、跨学科、多元化的师资培养机制，厚培文化素养底色，打造具有思政素养、数字素养的复合型思政教学团队，为文化遗产思政育人取得更多实效提供人才保障。其一，依据文化遗产数字化教学特点，定期举办专题工坊、技术实训、优秀课堂展示等活动，聚焦数字技术、文化遗产数字化、数字化教学工具等方面对思政教师进行重点培训，培养思政教师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操作、数字平台运用、多媒体课件制作等实践能力，真正实现数字技术为思政课堂赋能、提质增效。其二，集合校内思政教师、文化遗产研究骨干、数字技术专业教师，组成跨学科、复合型专项教学团队。其中，思政课教师负责理论阐释、价值引领，筑牢思政育人根基；文化遗产专家把握教学资源的专业性、准确性、真实性，确保文化遗产内涵的准确传递；数字技术专家承担教学平台建设、设备维护、数字资源优化等职责，为沉浸式教学提供技术支持。三者各尽其责、协同配合，共同保障文化遗产思政教学有效实施。其三，常态化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文博专家、革命先辈后代到校授课，受邀人员运用全息投影还原、数字影像回放等数智技术，对文化遗产的技艺流程、历史沿革、传承故事进行沉浸式讲解和可视化呈现，从而把原本静态的文化遗产变成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活态教学资源，为思政课堂带来真实、立体、生动的文化力量，切实促进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

除此之外，高校还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思政育人智能评价系统，全过程记录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数据，动态分析学生在文化素养、思想认知、价值认同等各方面的变化趋势，精准识别育人薄弱环节和学生成长短板，从而为内容优化、资源迭代、模式创新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实现数智赋能文化遗产“活化”育人的动态优化、长效提质，切实依托文化遗产“活化”应用促进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

未来，前沿技术的发展将使文化遗产“活化”与思政课教学的融合迈向更深层次，在使静态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数智化教学资源的同时，进一步拉近学生与历史文化的距离。各大高校需要抓住数智化转型的战略机遇，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基础设施、培育复合型师资、创新教学模式等方面系统发力，让各类文化遗产在思政课上进一步“活”起来，为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系大连工业大学副教授。本文系大连工业大学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项“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DSKLZX202503）